引 论

战后初期苏联对华政策

日本无条件投降和整个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来得之快，出乎同盟国的预料。在1945年2月雅尔塔会议上，罗斯福和丘吉尔之所以接受斯大林的条件，达成《雅尔塔协议》，换取苏联出兵中国东北，就是因为他们估计与日本还有三五年的恶仗要打。但美国给日本扔了两颗原子弹，苏军在东北与关东军打了6天的仗，日本便宣布无条件投降，整个反法西斯战争就此结束了，以至美苏等主要盟国都未来得及制定出处理战后问题的具体政策。

相对而言，美苏的对华政策是比较现成的，这就是落实《雅尔塔协议》和《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各项规定。这些规定是：

——承认蒋介石政府为中国唯一合法政府，支持它统一全中国，不干涉中国内政；

——维护中国领土完整，东北和新疆的领土主权归国民政府；

——外蒙古独立；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苏联恢复因 1905 年日俄战争失去的在东北的各项权益：旅顺口为苏联海军基地，中国长春铁路中苏共有、共营，大连为自由港。

如果用权利和义务打比喻的话，苏联必须尽第一和第二项义务，才能获取后几项权利。因为条约是它与国民政府签订的。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是《雅尔塔协议》的派生物，而《雅尔塔协议》是苏联同美国和英国签订的。《雅尔塔协议》还规定日本的库页岛南部和千岛群岛划归苏联。因此《雅尔塔协议》和《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关系到苏联战后整个远东利益。苏联要取得上述协议和条约中的利益，必须与美国相协调。这样，就以《雅尔塔协议》和《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为纽带，形成了战后美苏携手，共同支持蒋介石，挤压中国共产党，实现中国统一的政策框架。在日本投降到“冷战”开始这一段时间苏联的对华政策，就是按照这个总框架制定的。“在这样的框架中，苏联使自己居于中苏关系的支配地位，将国民党政府确定为主要的合法的交涉对象和伙伴，而把中共置于一种次要的从属地位”。[①] 其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配合美蒋取消中共对日本受降权，不支持中共武装对日受降

1945 年 8 月 9 日苏联对日本宣战，中共盼望已久的时机终于到来。当天毛泽东发表了《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檄文，

①张盛发：《战后初期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态度和立场》，《中共党史研究》，2000年，第 1期，第 58页。

号召一切抗日力量举行全国规模的反攻，“密切而有效地配合苏联及其它盟国作战”。[①] 8月10日中共中央对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发出指示，指出日本“有继续抵抗可能，亦有投降可能”。各中央局应布置动员一切力量对敌伪作战，并准备在敌人投降时占领大小城市和交通要道。[②] 从8月10日到11日，朱德总司令连续下了七道命令，命令吕正操、张学诗、万毅、李运昌各部，从现驻地向热河、察哈尔、辽宁、吉林进发。命令所有沿铁路线两侧区域之解放区部队积极进攻，迫敌投降。[③] 当时，由于八路军坚持敌后抗战，对华北、华中等地日军已经形成包围态势，对接受日军投降处于十分有利地位。但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当天，远东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和蒋介石却下令日军只能向不包括八路军在内的政府军投降，从而剥夺了坚持抗战八年的中共武装的受降权。苏联对这一违反常理的命令没有表示任何异议。

朱德总司令在8月15日日本投降的当天，向美、英、苏三国提交说帖。说帖指出：中共武装力量经过八年苦战，夺回近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解放了一万万以上的人民，组织了100万以上的正规军，220多万民兵，建立了19个大块解放区，包围了敌伪所侵占的大量中国城镇、交通要道及沿海口岸。因此，解放区的人民武装有权根据波茨坦宣言及同盟国规定之受降办法，“接受被我军所包围之日伪军队的投降”。[④] 说

① 《毛泽东选集》(一卷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年，第1119页。

②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5），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215页

③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5）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217－223页

④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5），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240页

帖是提交美、英、苏三国的，但中共主要希望苏联能出来说公道话，修改麦克阿瑟的命令，允许中共受降。但苏联政府对中共的要求未予考虑，于 8 月 28 日公布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中国也同日公布）。这时中共才明白，苏联已经在条约中对国民政府作出了保证，支持它统一全中国，不会支持中共接受日本投降的要求。朱德不得不调整他已经发出的命令。

二、力促毛泽东赴重庆谈判，不支持中共进行武装斗争

在美国的主导下，通过雅尔塔会议和中苏条约的签订构筑起来的战后美、中、苏共建东亚和平的框架有三根支柱：美苏关系、中（国民政府）苏关系和国共关系，如果有一根支柱立不起来，另两根支柱也不会稳固，整个框架必将倾覆。所以还在中苏条约签字的前两天的 1945 年 8 月 12 日，蒋介石就在美国大使赫尔利的说服下给毛泽东发出邀请，请毛泽东亲赴重庆，举行和平建国谈判。但延安方面没有回答。① 8 月 14 日、20 日和 23 日，斯大林以俄共（布）中央的名义，连续给毛泽东发来三封电报，说“中国不能再打内战，要再打内战，就可能把民族引向灭亡的危险地步等等”，还说，毛泽东的安全“由美苏负责”。② 毛泽东的安全“由美苏负责”一语，说明斯大林这三封电报是应美蒋的请求拍发的。为接毛泽东赴重庆谈判，赫尔利飞延安时还请苏联大使彼得洛夫同行，尽管彼得洛

① A.M.列多夫斯基著；陈春华等译：《斯大林与中国》，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年，第 232 页。

② 师哲回忆；李海文整理：《在历史巨人身边》，北京 中央文史出版社 1991年，第 308 页。

夫拒绝前往，[①] 但苏联敦促毛泽东赴重庆谈判的态度是明确的。美国政府和蒋介石集团要求毛泽东赴重庆谈判的目的是利用战后国内外要求民主与和平的潮流，发起一个和平攻势，企图通过和谈，解除中共武装，最后解决中共问题。斯大林发这三封电报并非是为揭露美蒋要求和谈这一阴谋而采取的一种策略，而是他确定的战后对华战略方针的组成部分。斯大林认为“在中国发展起义是没有前途的，中国同志应同蒋介石寻求一项暂行的协议（有的译本将“暂行的协议”译作“共处的模式”——引者），他们应加入蒋介石的政府，并解散他们的军队”。[②] 其实斯大林让中共达成“暂时协议”也好，寻找“共处模式”也好，就是让中共像他给法国共产党出的办法（让法共放弃武装，参加戴高乐政府）那样，放弃武装，去参加国民党政府。苏联则可以此与国民党政府建立一定的信任与合作关系，保持它对中国和东亚的影响。

与上述对华方针相联系，在毛泽东谈判期间，苏联对中共代表团采取了疏远和冷漠态度，以促使中共让步，使谈判达成协议。

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等人，远离延安总部，不可能及时利用苏军驻延安情报组与斯大林取得联系，毫无疑问，苏联驻重庆大使馆就成为毛泽东等人要经常联系的渠道。但出乎他们意料的是，苏联大使馆对他们如同陌路相逢。9 月 6 日，毛泽东问彼得洛夫大使，如果美国帮助国民党军队消灭共产党军

① A.M. 列多夫斯基著；陈春华等译：《斯大林与中国》，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年，第 232 页。

② （南）弗拉吉米尔·杰吉耶尔著；李潞等译：《铁托传》下，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资料室编印，1963 年，第 118 页。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队，苏联将采取哪些措施？大使回答，苏联希望看到一个政治上统一的中国，谈判应当继续下去，国共两党应该通过互相让步达成协议。[①] 10 月 5 日周恩来与苏联大使谈话时问，如果美军试图在张家口、长春和东北的内陆地区登陆，苏联将采取什么措施？大使回答，现在很难预见这种形势发展的所有具体细节。周恩来又问，在保证毛泽东同志在重庆期间的安全方面，中共可以从苏联使馆得到哪些实际帮助？大使回答，应当考虑到外国驻华使馆所处地位的复杂性。[②] 10 月 10 日在毛泽东结束重庆谈判、回延安的前夕，中共代表团一行来到苏联驻重庆大使馆，会见彼得洛夫等使馆官员，向他们介绍了国共谈判的情况。[③] 毛泽东问彼得洛夫，如果出现美国人在共产党（控制）地区登陆的情况应该怎么办？他回答，在这种情况下必须争取以和平方式解决问题，竭力避免同美国人发生冲突。[④] 苏联大使在以上几次谈话中，对苏联与美国携手，支持蒋介石，要求中共交出武装，放弃自卫的心情溢于言表。

同时，苏联使馆怕影响与国民政府的关系，对毛泽东等人不断提出带有敏感性的问题表示非常不满。11 月 25 日苏联使馆参赞对王若飞说，中共代表不顾中国目前的形势，近来过于频繁地试图与苏联使馆和苏联其它组织的领导人建立直接的联

① 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 0100，目录 33，案卷 13，卷宗 244，第 223－224 页。转引自张盛发：《战后初期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态度和立场》，《中共党史研究》，2000 年，第 1 期，第 59 页。

② 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档案号不详。转引自张盛发：《战后初期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态度和立场》，《中共党史研究》，2000 年，第 1 期，第 59 页。

③ A.M. 列多夫斯基著；陈春华等译：《斯大林与中国》，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 年，第 302－303 页。

④ 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 0100，目录 40，案卷 7，卷宗 248，第 43－44 页。转引自张盛发：《战后初期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态度和立场》，《中共党史研究》，2000 年，第 1 期，第 59 页。

系，引起了严密监视共产党行动的有关机构的注意。因此他建议王若飞从中得出应有的结论。[①] 这些话是很有分量的。

毛泽东飞重庆本来就是抱着实现和平的目的去的，他认为谈的好，谈出一个和平、民主、统一的中国来，对全国人民有好处。但毛泽东作出重大让步，最终达成协议，不能说与苏联的态度没有关系。

三、不介入马歇尔调停，与中共保持一定距离

落实“双十协议”的两项重大举动是：一、召开各党派代表和无党派人士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二、美国派马歇尔作为美国总统特使来华进行国共两党的调停。

马歇尔的调停方针是：一方面约束国民党不能大打内战，以避免把美国卷进去，另一方面又大力援助国民党，增强蒋介石的实力，使中共处于弱势地位，主要通过政治手段将共产党“统一”到国民政府内，实现全国和平。这与苏联的对华政策大体吻合。苏联虽然担心美国的调处将扩大对中国的影响，对己不利，但它对中共的力量估计不足，怕公开支持中共反而对己更加不利，因而强调中国的和平、统一应在没有外部势力（美国）干涉的情况下实现，以牵制美国。12 月 27 日发表了苏、美、英三国外长莫斯科会议公报，公报是苏美经过一番斗争，立场得到协调的产物。公报宣布“必须在国民政府领导下实现中国的团结与民主化，广泛地吸收民主分子到国民政府的一切机构中，并且必须停止内争”，并重申“不干涉中国内部

① 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 0100，卷宗 20，第 5－7 页。转引自张盛发：《战后初期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态度和立场》，《中共党史研究》，2000 年，第 期，第 60 页。

事务之政策”。前一部分是美苏的共识；“重申”是苏联强调的内容。在对华政策和对美斗争需要时，苏联经常引用这段内容。而马歇尔加大对华调停的力度，也是根据这段内容。公报表明，苏联对马歇尔的调停没有异议。

面对美国大力支持蒋介石的政策，中共在政协会议和在美国调停中应采取怎样的政策和策略，毫无疑问，它自然要向苏联方面征求意见和建议。12月中共参加政协会议的代表团到达重庆，在与国民党谈判之前，代表团成员叶剑英、王若飞约见苏联大使彼得洛夫。由于大使馆事先已接到指示，不要暴露与中共代表尤其是来自延安代表团的联系，彼得洛夫遂称病不出，拒绝接见中共代表。[①] 1946年1月，叶剑英和王若飞到苏联大使馆要求会见大使。大使当然还在“生病”。一秘列多夫斯基会见了叶剑英和王若飞。叶剑英提出，中共是否应当参加马歇尔的调停，因为这种调停意味着美国直接干涉中国的内政，因而尚未做出决断。蒋介石准备在谈判中涉及东北问题，这就将触及到苏联的利益，苏联方面就应当参加讨论。叶剑英问苏联对这两个问题持何态度？由于第二天中共代表团就要与国民党代表举行谈判，中共代表团等候大使对这两个问题的“忠告”。列多夫斯基经请示彼得洛夫，回答说：“关于涉及中国民主化和结束内战的谈判中共代表团应该听取中共中央委员会的意见和指示；苏联不能就此等问题向代表团发表意见。至于满洲，苏联大使认为这样的讨论为时尚早，因为无论中央政府还是马歇尔都未正式提到这个问题。”列多夫斯基“还补充

① A.M.列多夫斯基著；陈春华等译：《斯大林与中国》，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年第384页。

说，关于和平解决中国国内问题和停止内战，苏联政府的立场已经在莫斯科会议的公报中表示得很清楚了”。[①] 这种回答似乎是模棱两可，但若按莫斯科会议公报判断，中共还是要接受马歇尔的调停，因为公报代表苏、美、英三国的共识。

当时马歇尔确实有使中国实现和平民主的意愿，中共对马歇尔的调停也抱有希望，最后接受了马歇尔的调停。

四、协助国民政府和平解决新疆问题

9 月上旬，新疆三区民族军打到马纳斯河畔，在拿下迪化（今乌鲁木齐市）指日可待的时候，苏联命令民族军停止进攻。随后，应国民政府的请求，出面调停三区革命政府与中央政府代表张治中谈判，组成新的新疆省政府，和平解决了新疆问题。

五、禁止中共部队公开进入东北大城市并向国民政府移交这些大城市的行政权

9 月 15 日驻东北苏军总司令马林诺夫斯基派他的代表德米特利·别洛卢索夫飞抵延安，向中共中央转交自己的亲笔信，要求中共部队不要公开进入沈阳、长春和哈尔滨等东北中心城市，到远离这些城市的农村去发展力量。后来又敦促已经进入沈阳和长春的中共部队撤离，将这些大城市的行政权移交给国民政府。尽管苏联走到这一步是不情愿的，而且是在国民政府严重交涉下进行的，但它毕竟表明自己履行了中苏条约。

① A.M. 列多夫斯基著；陈春华等译：《斯大林与中国》，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 年第 384－385 页。

苏联政府的上述政策给予蒋介石政府很大支持，再加上美国政府的大力援助，蒋介石的力量迅速膨胀。蒋介石的头脑也随着膨胀起来。他一心想用武力消灭共产党，大打内战，但最终葬送了自己。

面对美、苏、蒋联合对己的局面，中共承受着沉重的压力。当时的形势，似乎中共只有放下武器，缴械投降国民党的一条路可走。但是大智大勇的毛泽东没有在压力下屈服，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灵活地运用战略和策略，及时派军队出关，在蒋苏关系之间和美苏关系之间打进一个楔子，使国际环境开始向有利于己的方面转化。

二战后初期苏联对华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是抗战期间对华政策的惯性发展，苏联继续以抗战期间的合作伙伴美国和蒋介石政府为合作伙伴。但是随着战后美苏矛盾的展开，特别是在“冷战”开始之后，苏联为对抗美蒋，对华政策开始向中共一方倾斜。这种政策倾斜首先是从东北开始的。

第一章

中苏关于东北撤军交涉

第一节国民政府筹收东北

一、苏军占领下的东北

1945 年 8 月 9 日苏联对日宣战，8 月 15 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①] 但日本关东军并未放下武器，直到 8 月 17 日下午 3 时,日本关东军司令山田乙三才通过电台广播了关东军司令部

① 苏联接到日本的投降电文比中国早一天，为 8 月 14 日,文字内容也有差异。他所收到的是由瑞士政府转交美国政府的日本投降书电文。现将该电文附录如下：关于日本政府 8 月 10 日照会接受波茨坦宣言的各项规定以及关于美国贝尔纳斯国务卿 8 月 11 日以中美英苏四国政府名义送致的复文，日本政府通知四国政府：一、天皇陛下已颁布敕令，日本接受波茨坦宣言的各项规定。二、天皇准备授权并保证日本政府及日本大本营执行波茨坦宣言的各项规定所必须的条件。天皇还准备命令日本所有海陆空军当局及在各地受其管辖的部队停止战斗行动和交出武器，并颁发盟军统帅部为执行上述条件所需要的各项命令。见安徽大学苏联问题研究所、四川省中共党史研究会编译：《苏联＜真理报＞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选编 1937 年 7 月——1949 年》,第 3 辑，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1988 年，第 523 页。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的停战声明：“为了尽快实现停止军事行动的命令，今晨，我关东军司令部已命令我方代表于 8 月 17 日 10 时至 14 时（东京时间）乘飞机前往牡丹江、密山、穆棱等市，以便与红军指挥部建立联系。’① 苏联远东军总司令部电令“关东军司令官从 8 月 20 日 12 时起，在全线停止一切对苏作战行动，放下武器，投降就俘”。② 随即，派代表到牡丹江和穆棱机场，与日方代表确定日军受降事宜。从 8 月 18 日起，除虎林一地仍有激烈抵抗外，日军全部停止抵抗。为迅速控制中国东北，解除敌伪武装，防止档案、财产和物资的销毁和转移，苏军司令部决定派空降兵和先遣队首先占领东北中心城市。苏联空降兵 8 月 18 日占领哈尔滨，8 月 19 日占领长春、吉林和沈阳，8 月 22 日占领旅顺和大连，首先将这些城市的日军指挥机关和日伪军政首脑控制起来。随后，各集团军抽调摩托化步兵、坦克连、坦克营、自行火炮营、反坦克炮兵连等机动性最高、战斗力最强的战斗单位和高素质的指战员组成分遣队，日夜兼程，各自向东北各个中心城市挺进。8 月 20 日先遣队会同空降兵正式接管了沈阳、长春、哈尔滨和吉林等大城市。 8 月 23 日后贝加尔方面军第 39 集团军开进旅顺口，8 月 24 日进占大连。8 月 24 日，苏联元帅、后贝加尔方面军司令马林诺夫斯基与他的参谋长扎哈罗夫大将飞抵长春，出任驻中国东北苏军总司令。8 月 31 日后贝加尔方面军的整个司令部从王爷庙（乌兰浩特）转到长春，在原关东军司令部大楼开始办公。至

① 苏联国防部档案馆：类 220，总目 293558，卷宗 2，第 143 张。转引自 M.B. 扎哈罗夫主编：《结局》，莫斯科，1969 年，中译本，上海，1978 年，第 257 页。

② M.B. 扎哈罗夫主编：《结局》，莫斯科，1969 年，中译本，上海，1978 年，第 257 页。

此，苏军完成了对东北的军事占领，开始了紧张的“消化战果”的工作。

这些工作包括：1. 解除日军武装和处理日本战俘。 2. 在东北建立临时管理体制。3. 强化旅大租借区的管理（在租借区内以及大连实行军事管制体制，建设最安全的环境）。 4. 尽量多地占有东北经济成果，为与中国政府进行经济合作谈判做准备。所有这些工作围绕一个中心：巩固和发展苏联从雅尔塔协议到中苏条约所取得的成果。但是按中苏条约规定，时间只有 3 个月，苏军当局的负重并不比作战时轻松。

（一）解除日军武装和处理日本战俘。

日本关东军被苏联远东军击溃后，其相当一部分在战败和溃退的过程中即已向红军投降。山田乙三宣布“停战”声明之前，天皇特使竹田宫亲王已飞抵长春，向关东军首脑们宣读了天皇的“停战”谕令。山田声明播发后，日军各部基本上放下了武器，等待受俘。所以，苏军各部的空降兵和先遣队在各个中心城市解除日军武装和受降都进行得很顺利，出现了上百人接受上万人投降的局面。例如，在哈尔滨 120 人的空降兵接受了 43000 名日本官兵的投降；在长春几百名苏军接受 15000 余人日本守备兵的投降。[①] 8 月 20 日 12 时截止，成建制的关东军均已投降；到 8 月底，近 60 万日军官兵全部受降完毕。其中有 148 名将军，594,000 名官兵。从 9 月 5 日开始，山田乙三以下关东军所有将官被分批用飞机押往哈巴罗夫斯克，关进战犯收容所。其余所有各地官兵被集中到就近各大城市，从 9

① M.B.扎哈罗夫：《结局》，莫斯科，1969 年，中译本，上海，1978 年，第 261.272 页。

月初开始，每千人一队，在苏军押解下乘铁路闷罐车转到西伯利亚各地俘虏营。从此，盘踞在东北土地上达 14 年之久、对中国人民犯下滔天罪行的日本最后一支王牌军从东北的土地上被彻底地清除掉了。

（二）扫荡日伪余孽，抗联重返东北

据《苏联军队进入中国东三省后苏联军总司令与中国行政当局关系之协议》，“一俟收复区域任何地方停止为直接军事行动之地带时，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即担负管理公务之全权”，[①]即苏军每占一城一地，国民政府就收复一城一地。但是，当时国民政府远在重庆，政府军队也远在大西南和南方沿海一带，无法做到按条约规定随时接收。这样，在广大的东北苏军占领区，就成为无人行使行政管理权的“真空地带”。敌伪势力和各种反动势力趁机出来接管行政权利。苏军人地两生，中国东北抗联遂成为苏军当局最重要的借重力量。苏军首先将抗联运往东北各战略据点，与抗联一起采取得力措施，分步骤地将敌伪势力肃清；然后，逐步地建立起以苏军军管体制为主、以地方自治机构为辅的临时管理体制。

8月 9 日，苏军开始进攻不久，就突破了关东军的防线。山田乙三宣布关东军准备退守南满，要求“满洲国”也随着“迁都”通化。12 日，溥仪携嫔妃出逃，伪国务总理张景惠等陪逃。伪勤劳奉仕部大臣于镜涛等留守长春。 17 日溥仪在通化宣布“退位”，决定流亡日本。19 日晨在沈阳机场转乘飞往

①李嘉谷编：《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 1933—1945》，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 年，第 650 页。

日本飞机的过程中，溥仪一行被苏军俘获。[①] 儿皇帝被俘，傀儡国伪满洲国遂灰飞烟灭。但伪满反动势力却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于镜涛利用留守长春的方便以及苏军不明真相，竟谋得个长春市临时市长的职位。他将伪满“简任级”和“荐任级”80多人收罗起来，委派各种官职，居然拼凑起来一个长春市临时市政府。[②] 前伪满驻汪精卫伪南京政府“大使”吕荣寰，纠合伪满大臣荣厚、蔡运升等人组织了一个“东北维持会”，自任会长，并通电东北各地伪满官员，“命令”他们出来维持各地秩序。[③] 一时，惯于在历史转折关头投机钻营的民族败类们纷纷出笼，弹冠相庆。但这批恶贯满盈的人渣并未逃脱正义的审判。8月31日，苏军长春警备司令部请他们去“作客”，就势将他们当场拿下，用飞机押往赤塔，关进俘虏营。这些伪满高官有：伪总理大臣张景惠、伪参议府议长藏式毅、伪宫内府大臣熙洽、伪军事部大臣邢士廉、伪外交部大臣阮振铎、伪民生部大臣金铭世、伪交通部大臣谷次亨、前驻南京伪大使吕荣寰、伪兴农部大臣黄富俊、伪经济部大臣于静远、伪勤劳奉仕部大臣于镜涛、伪文教部大臣卢元善、伪司法部大臣阎传绂、伪兴安局总裁巴特玛拉布坦、伪侍从武官长张文涛、伪祭祀府副总裁沈瑞麟等；嗣后，苏军当局又抓了一大批伪满高官（以省级行政长官为主），分批押往苏联。[④] 9月下旬，苏军又

① A. 科夫通－斯坦科维奇：《沈阳卫戍司令》，载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在中国道路上(1937—1945)回忆录》,莫斯科，1989年，第347页。

②孟宪章等著：《苏联出兵中国东北》，北京：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年，第191页。

③孟宪章等著：《苏联出兵中国东北》，北京：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年，第191页。

④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藏：《溥仪、张景惠等致斯大林函 1950年2月》。

先后逮捕了掌握伪满政府实权的一大批日本官吏：伪国务院总务厅长官武部六藏和次长古海忠之，伪国务院各部次长，伪新京警察副总监宫崎专一等一批日本警官，以及协和会原中央本部长三宅光治以下近 1000 名协和会骨干分子，押赴西伯利亚各地的战犯收容所和俘虏营。[①] 苏军对伪满洲国敌伪势力坚决打击，毫不留情，不仅为建立稳定的临时管理体制扫清了障碍，而且赢得了东北人民的信任和拥护，促使东北各阶层真正的爱国人士踊跃地参加各级地方自治机关。

最早占领哈尔滨、长春、沈阳、吉林、齐齐哈尔等中心城市的苏军空降兵和先遣队汇合后，首先建立起本城市的卫戍司令部。在解除日伪军武装的同时，卫戍司令部负起维持市区和郊区秩序，执行警备勤务的责任。相比之下，在解除敌伪武装和受理敌伪投降方面的任务并不困难，因为这方面的任务是确定的：有多少日本官兵、多少伪满官员要逮捕，多少武器要收缴，多少要害部门要接管都有案可查。而要维持地方秩序却是十分困难的，因为日本法西斯和伪满洲国对东北长达 14 年的统治，在社会上培植起了盘根错节的反动势力。这股反动势力并不会随着其头头们被捕、被俘、被关进战犯所和俘虏营而销声匿迹，相反地，他们趁苏军刚到东北，不了解当地情况的机会，纠合其它各种社会恶势力，纷纷出笼，组织形形色色的“维持会”。此外，大批伪满军队，在作战过程中，并未完全解除武装、甚至并未加以改编就被苏军委派维持地方治安。例如，在后贝加尔方面军穿过大兴安岭时，伪满第 10 军管区司

① 孟宪章等著：《苏联出兵中国东北》，北京：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 年，第 193 页。

令和参谋长向苏军第 113 步兵军团投降。苏军军团长指示该军管区司令：“军区管理机关暂不解散，但要将武器交给红军，只留下一部分武器维持治安。”“关于如何使用留下的武器问题，建议他们的司令部同地方自治机关协商解决。”① 当时，所谓的“地方自治机关”根本就没有，所以这批投降的伪军便自行其是。其中，有相当一批尚未被完全解除武装的伪满军，与伪宪警、汉奸、土匪相勾结，摇身一变，成了国民政府的“先遣军”（“维持会”和“先遣军”中相当大的一部分是得到国民党特工人员支持的，在长春、哈尔滨、沈阳、大连、吉林等一些大城市和一些县城，他们公开挂出了国民党某某市党部、区党部、县党部的牌子）。“维持会”与“先遣军”相互表里，打击残害一切爱国力量和进步势力，网罗牛鬼蛇神，梦想为他们将来正式接管政权拼凑社会基础；对普通居民则进行欺压勒索，甚至不惜制造命案；在东北的几个中心城市，很少入夜后听不到枪声；在沈阳、大连火车站，还发生了光天化日炸弹爆炸事件；在沈阳市，武装暴乱团伙在一天夜间包围了苏军第一区警备司令部，开枪打死了司令部的两名雇员，在其它几个区也发生了交火，苏军出动装甲车才平息了叛乱。② 一些与中央大员攀上“亲戚”的团伙更是利令智昏，他们居然敢在太岁头上动土，向苏军沈阳卫戍司令部科夫通司令开刀。他们选了一个日本敢死队队员，让他趁夜间爬进该司令员的汽车底

① B.博依科：《解放使命》，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在中国道路上（1937—1945）回忆录》，莫斯科，1989年，第 316页。

② A.科夫通－斯坦科维奇：《沈阳卫戍司令》，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在中国道路上（1937—1945）回忆录》，莫斯科，1989年，第 353－354 页。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